

论投资运行与经济运行

闻 潜

资产是由投资形成的。怎样增加投资以促成资产增长和价值增值,始终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探讨投资增长规律,以揭示投资运行和以价值增值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均衡运行和快速、持续增长的秘密,即寓于此。

一、投资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

关于投资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1 投入。投资,即资金的投入。从投入来看,投资运行依赖于经济运行。这是由于:(1)用于投资的货币资金,来自资产的价值增值及其分解;(2)实现投资的物资保证,即以生产资料为主要成份的投入品供给,来自物质产品的生产;(3)由投资所形成的需求和由生产所形成的供给,需借助市场予以调节和平衡。简言之,经济运行是投资运行的基础,而投资运行依存于经济运行。任何脱离经济运行的投资,都是不可能形成的,纵令能够强制形成,也是难以充分实现的。

2 产出。投入是为了产出。产出包括物质产品及其价值。就产出而言,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又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主要理由是:在物质产品方面,生产量的增长,需以生产能力的扩大为前提;在价值量方面,产值的增长需以资产规模的扩大为基本条件。无论生产能力还是资产规模的扩大,都直接决定于投资的增长。这是生产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在分配方面,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可供分配的增值价值的规模。在流通方面,市场容量的大小,既取决于由增值价值分解和使用所形成的需求量,又取决于来自生产的供给量。既然分配和流通决定于生产,而生产依赖于投资,那么分配和流通也最终依存于投资。

然而,分配和流通与投资之间的联系,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比如,某些商品长期短缺,或者解释为消费过于集中,或者被指责为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所致。又比如,一些商品年年过剩,或者解释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或者被指责为“货不对路”;限产压库不力所致。其实,究其根本原因,前者如农产品、城市普通住房、电讯等,是由于长期间投资增长过于缓慢;后者则是投资连年过度增长的反应。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它们虽处于限产压库的控制之下,但市场上仍然滞销,就是由于连续大量增加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缘故。所以对于分配、流通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我们应加深理解,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可见,经济运行又依存于投资运行。

二、投资的增长机制

那么,投资运行在何种程度上依存于经济运行呢?这与投资增长机制有关。投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1 经济增长率。这是决定投资增长率的一个基本因素。无论资金来源的扩大,还是资金供给的增加,抑或资金投入所需物质资料的提供,都取决于现有经济的增长。一般地说,经济增长率越高,投资增长率也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投资增长率也越低。此乃正比例关系,不过我们的认识尚待深化,这里应指出如下两点:

(1) 这一结论,是以经济效益趋于稳定为前提条件。如果经济效益本来偏低,它在经济运行中不但不能提高,反而呈现降低的态势,那么要增加投资,就会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纵使经济一时增长得较快,投资增长率也不可能相应上升。因为:社会能有多少资金用于增加投资,这不仅决定于经济增长率,还决定于投入产出率。实际经验显示,靠高投入可抬高经济增长率,但是由于投入产出率长期偏低,那么高的投资增长率是难以为继的,被抬高的经济增长率终究也不得不掉下来。可见,经济效益对投资增长率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依存关系,必然是以经济效益的水平及其是否稳定为转移。

(2) 这一结论的另一前提,是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如果经济结构失调,要想增加投资,那也不会有可靠的物资保证。就是经济增长率一时上升,投资增长率也不可能相应上升。在产业结构失调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投资的增长不但取决于资金供给,还取决于商品市场是否均衡。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高投入必然伴随以经济结构的失调,而经济结构失调将导致或加重市场非均衡。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得不以“调整”或“整顿”的方式,来大幅度地压低投资增长率。所以,经济结构对投资增长率也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依存关系,也将以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为转移。

总之,经济增长率在客观上受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制约。我们说,投资增长率伴随经济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化,就是以经济效率稳定和经济结构比较合理为基本根据的。否则,投资运行就无规律可寻。

2 总储蓄率。总储蓄由三部分组成:(1)家庭储蓄;(2)企业储蓄;(3)政府储蓄。总储蓄率,即这三项储蓄之和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又称为国民储蓄率。这是影响投资增长率的又一基本因素。

一般地说,总储蓄率高,投资增长得快;总储蓄率低,投资增长得慢。或者是:总储蓄率提高,投资增长率上升;总储蓄率降低,投资增长率下降。这也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但是,这样来描述投资增长的变化,似乎仍有不足之处。

大体上说,总储蓄率决定于如下诸因素:(1)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NP;(2)消费水平;(3)政府负债率。从根本上说,总储蓄率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GNP没有增长或增长较少,总储蓄率就难以上升,纵然有所提高,其程度也很有限。我们亦不能排除它会有某些程度的下降。所以,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总储蓄率最基本的因素。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总储蓄率的变化受消费水平的制约。储蓄与消费密切相联,无论就居民收入或国民收入来看,二者都是互为消长的。所以,消费水平的变化必然会波及总储蓄率。总储蓄率通常是在消费水平提高较慢时上升,而在消费水平提高较快时下降。

在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情形下,总储蓄率的变化还受政府负债率的制约。政府储蓄表现为财政结余,政府负债表现为财政赤字。目前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财政赤字,总储蓄主要决定于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储蓄。我国财政也连年存有赤字。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若政府负债率降低,财政赤字缩小,总储蓄率的变化就较少受到影响;反之,政府负债率上升,财政赤字扩大,总储蓄率的变化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总之,总储蓄率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并受消费水平和政府负债率的制约。投资增长率伴随总储蓄率的升降而变化,就是以此为立论前提的。若忽视这些因素的作用,要查明投资运行规律也是很困难的。

概言之,投资增长率既决定于经济增长率,又决定于总储蓄率。二者的结合,大体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总储蓄率基本不变。这时,经济增长率是决定投资增长率的唯一因素,所以它们将同步增长。如果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变化,此种情况的出现则意味着:不但居民消费适度,而且政府债务基本上是稳定的。

第二种:总储蓄率上升。这时,投资增长率超过经济的增长率,其程度决定于总储蓄率提高的程度。在假定条件与上述规定相同的约束下,这种情形的出现或者是适当抑制消费的结果,或者是大量压缩政府债务所致。当然,也可能是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的。

第三种:总储蓄率下降。在此时,投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其程度决定于总储蓄率降低的程度。现在仍然接受上述规定的约束,那么此种情形的产生,或者是由于消费过度增长所致,或者是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所致,抑或是这几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以上描述的,是投资增长机制运行最基本的情形。应当再次提及,这仅仅是从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依存性来观察的,还需要分析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以便扩展我们的视野,对这些结论也可予以必要补充。我们即将说到这一点。

三、国际经验:储蓄——增长——储蓄的循环

在考察投资与GNP的关系之前,先来讨论一条国际经验。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项研究报告中认定:储蓄——增长——储蓄循环的性质,与一国的储蓄率直接相关。这包含两层意义:(1)高储蓄——高增长——高储蓄,此为良性循环;(2)低储蓄——低增长——低储蓄,此系非良性循环。

一般地说,发达国家总储蓄率比较低,经济增长率也比较低,是非良性循环。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它们的总储蓄率比较高,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呈现良性循环。

1989年至1993年,世界总储蓄率前10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韩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瑞士、台湾、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朗。除了日本、瑞士之外,其它皆属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据粗略统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1.5倍至3倍。

上文指出,总储蓄率首先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何以经济水平高的发达国家总储蓄率低,而经济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总储蓄率都比较高呢?看来,这与消费方式有关。各国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但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的各个阶段,皆崇尚高消费,这不能不影响到它们的储蓄率。比如,私人(含企业和家庭)储蓄率偏低。在1960-1972年和1981-1993年间,私人储蓄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这是导致发达国家总储蓄率较低的一个基本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财政赤字大,增长快。1960年至1972年,政府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由于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在1981年至1993年间,政府储蓄的比重降至0.5%。所以,发达国家总储蓄率较低,是由高消费和政府债务负担重共同造成的,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是高的。

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其总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 1970 年的 19% 提高到现在的 27%。其中,亚洲国家的更高。

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引发如下思考:

第一,高储蓄可促成高增长。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重视稳定和提高储蓄率。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外来资本不足的困扰。发达国家储蓄占世界储蓄总额的一半左右,但其储蓄率在明显下降,就是储蓄率向来很高的日本亦不例外。正因为如此,它们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提高本国储蓄率,以弥补外来资本的不足,保证自己经济持续地增长。

第二,高增长可带来高储蓄。但是,要使之变为客观现实,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即实行适度消费。无视这条规则,纵然经济增长得较快,那也难以带来高储蓄。可以说,高储蓄是适度消费的伴生现象。就居民储蓄来说,这恐怕是一条铁的规律。

第三,高增长带来高储蓄还须遵循一条规则,即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债务。否则,纵令居民储蓄率比较高,总储蓄率也不会高,很可能是低的。例如,近几年法国家庭储蓄率为 13%,这使 1994 年该国对外投资资金盈余高达 494 亿法郎,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7%。企业因为高利率不肯贸然投资,也握有大量储蓄。但政府的财政赤字很高,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致使总储蓄率维持在 12% 左右。可以说,低储蓄是政府高负债的产物。这也是一条不可更改的规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得到两点认识:其一,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是适度的。其二,中国政府储蓄率比较高。尽管政府长期存有财政赤字,但每年都在进行数额相当可观的投资,这是促成高储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中国储蓄率居全球之首,这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保证。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加上消费适度(不存在消费膨胀),政府又重视控制债务的扩展,以致稳定地形成高储蓄。所以,高储蓄——高增长——高储蓄的循环,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又是中国的基本经验。下面对投资与 GNP 之间关系的考察,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基本根据的。

四、投资与 GNP

投资与 GNP 的关系,是以投入和产出为纽带形成的。前面对投资增长机制的考察,是从投入方面揭示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依存性,现在则需从产出方面来讨论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严格地说,投资和 GNP 的关系是由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投资增长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投资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也越低。说得简明一点是,经济增长率以投资增长率为转移。若投资增长率比较高,经济则一定日趋繁荣;倘若投资增长率比较低,经济则将会走向萧条。不过,这是投资运行对经济运行所起作用的一般性描述,要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系,还需要作些具体考察。

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决定于两个因素:

1. 投资效益,即资金产出率(Y/T)。经济增长率不但决定于投资增长率,还决定于投资效益。假定资金产出率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投资的增长率;反之,资金产出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必然低于投资的增长率。至于怎样提高投资效益,这在当前基本上是投资体制问题,现在不作讨论。

关于储蓄——增长——储蓄的循环,在上节着重分析了它的后一阶段,特别是高增长带来高储蓄的条件。这里转向分析它的前一阶段,即高储蓄怎样才能带来高增长。其条件是:投资效益应逐渐提高,最低也应该是稳定的。假定投资效益降低了,高储蓄就难以促成高增长。纵令它能带来高增长,经济增长率也低于投资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金投入相对增加,由投资带来的经济收益必然相对减少,并迫使总储蓄率下降。

2 投资结构。除投资效益外,投资结构也是影响投资和经济两种增长率比例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投资结构,指的是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比例。短期投资,当年投资当年即可投产。长期投资,当年投资后续年度才能投产见效。一般言之,当短期投资的比重上升而长期投资的比重下降之时,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投资增长率;相反地,当长期投资的比重上升而短期投资的比重下降之时,经济增长率将低于投资的增长率。

高储蓄促成高增长,不仅以较好的投资效益为条件,而且要以合理的投资结构为前提。投资结构如何,这涉及经济近期运行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肆意抬高短期投资的比重,以促使近期经济过度增长,因为这会压低长期投资的比重,进而制约远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远景而执著地抬高长期投资的比重,那也是不适当的,这是因为,如此必然会压低短期投资的比重,从而抑制近期经济的增长。所以无论任何时候,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比例都必须是适当的。

总之,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例,是由投资效益和投资结构共同决定的。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投资结构协调,投资效益必定提高;否则,投资结构失调,投资效益也一定降低。这为长期实践经验所证实,因而具有规律性的意义。当投资结构日趋协调,投资效益不断提高之时,经济繁荣就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当投资结构失调而难以调节,投资效益日益下降而难以抑制之时,经济就必将走向衰微和萧条。平常有一种错觉,似乎经济兴旺发达简单地维系于投资规模,事实上并非如此,投资结构和效益如何,才是经济兴衰的主要制导因素。

为了全面考察投资和GNP的关系,现在须引入投资增长机制。这样,可以从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二者增长率的比例作整体分析。

大家已知,投资增长机制的运转有三种情形。头一种以总储蓄率不变为条件,投资与GNP同步增长。不过,这只联系到投资的来源和保证,并未涉及投资的使用。若考虑到投资的使用,即使总储蓄率不变,投资和GNP的关系也将发生两种变化:(1)在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结构也更加合理之时,经济增长率必然超过投资的增长率;(2)在投资效益下降、投资结构失调之时,经济增长率势必低于投资的增长率。

第二种以总储蓄率上升为条件,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同样,这仅仅联系到投资的来源和保证,而未涉及投资的使用。如果把投资的使用考虑进去,投资和GNP的关系与之相比较,就会有显著差别:(1)在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结构比较合理之时,尽管投资增长率在三种情况中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仍有可能与之保持同步,甚而超过之。(2)在投资效益下降,投资结构失调之时,经济增长率不仅低于投资增长率,而且其差率较之当初还会扩大。前一种变化表明,总储蓄率的上升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后一种变化意味着,尽管总储蓄率提高了,也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

最后一种以总储蓄率下降为条件,投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和上面情况相同,仅仅着眼于投资的来源和保证,而未考虑投资的使用。现在也把投资的作用考虑在内,投资和GNP的关系与之相比较,也会出现重要区别:(1)在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结构有所改善的时候,经济

增长率超过投资增长率的程度有可能扩大, 尽管总储蓄率有所降低。(2) 在投资效益下降, 投资结构失调的时候, 经济增长率非但不能超过投资增长率, 它还将低于投资的增长率。前一种变化表明, 总储蓄率下降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可以适当减轻; 后一种变化意味着, 总储蓄率下降所造成的影响, 必然更为严重。

可见, 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包含有众多层次。但我们的分析仍未结束, 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有关国际经验, 然后对我国这一敏感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五、国际经验: 投资与 GNP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 经常呈现出良性循环。这集中表现在投资和 GNP 的关系上。

下面是亚洲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国家和地区, 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由世界银行所提供的这份资料, 可充分显示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前后, 投资和 GNP 之间关系的变化趋势。

表 1 表明:

(1) 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列的变化, 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有时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用+ 表示), 有时经济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用- 表示)。在香港, 投资和 GNP 也出现过等速增长。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

表 1 一些亚洲国家(地区) 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

	1965- 1980 年			1980 年- 1990 年		
	年均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GNP	投资	差率	GNP	投资	差率
新加坡	10	13 3	+ 3 3	6 4	3 6	- 2 8
韩国	9 9	15 9	+ 6 0	9 7	12 5	+ 2 8
香港	8 6	8 6	0	7 1	3 6	- 3 5
泰国	7 3	8 0	+ 0 7	7 6	8 7	+ 1 1

注: 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

(2) 但是, 无论投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 还是经济增长率超过投资增长率, 其差率都不大。就前者言, 最大为+ 6% (韩国), 最小为+ 0 7% (泰国); 就后者言, 最大是- 3 5% (香港), 最小是- 2 8% (新加坡)。这意味着, 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是相当协调的。

(3) GNP 相对于投资有更大的增长。新加坡在前一个时期, 投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 3 3 个百分点, 到了后一个时期, 经济增长率反而超出投资增长率 2 8 个百分点。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韩国, 虽然投资增长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 但其差别却明显缩小。前一个时期是 6 个百分点, 后一个时期是 2 8 个百分点, 即缩小了 3 2 个百分点。唯一的例外是泰国, 投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有所扩大, 即由前一个时期的 0 7% 扩大到后一个时期的 1 1%, 增加 0 4 个百分点。这表明, 不但其投资结构日益改善, 投资效益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总的态势可这样来描述: GNP (或 GDP, 与投资虽非同步增长, 但二者增长率的差别不是扩大, 而是缩小的。经济增长率日趋接近于投资增长率, 这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在我国,与上述情况相对照,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其情形,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投资增长率过高,最高为50.6%(1993),最低也有18.6%(1991)。如此高的投资增长率,表列多数年份中,都是当年经济运行难以实际承受的。

二是投资过度增长的成因,主要是投入品价格大幅度上涨。1992年,投入品价格上涨率已高达两位数。在此基础上,1993年投入品价格又上涨了26.6%。随后两年间,其涨幅虽有缩小,但仍居高位。

表2 中国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

年份	按现行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GNP 增长率 (%)	投资增长率 (%)	差率	GNP 增长率 (%)	投资增长率 (%)	差率
1991	16.8	18.6	+ 1.8	9.5		
1992	23.0	37.6	+ 14.6	14.0		
1993	29.4	50.6	+ 21.2	13.3	22.0	+ 8.7
1994	30.3	27.8	- 2.5	11.6	15.8	+ 4.2
1995				10.0	11.0	+ 1.0

注:本表中的投资为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增长率,运用国家统计局有关年度统计公报的数字,GNP 增长率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三是投资结构失调和投资效益降低,也是造成投资过度增长的重要原因。比如,1992年投资增长率和GNP 增长率相比较,前者超过后者14.6个百分点,双方均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前者仍高于后者十几个百分点。1993年投资与GNP 二者增长率的差距继续扩大,达到2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仍有8.7个百分点。不过,后两年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

因此,当前必须重视改善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控制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为此,须适度调节投资增长率,同时注意改善投资结构,并致力于提高投资效益。

如上所述,中国总储蓄率很高,而且相当稳定。这是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促成的,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反映。这本来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投资效益十分低下,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要长期坚持实现高储蓄——高增长——高储蓄的良性循环,目前就不能不面临诸多困难。投入品价格急剧上涨,就是这种情况的市场反映。所以,在适度调节投资增长率的同时,必须把提高投资效益放在突出的地位。

六、关于储蓄和投资的恒等式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储蓄等于投资,这被视为一种恒等式。其意义在于揭示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不管投资者和消费者如何行动,储蓄和投资都会相等。现在,我们要考察投资运行和经济运行的关系,对于贯穿于西方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这一恒等式,自然感到关切,也需要做出适当评价。

储蓄和投资相等的理论,它包括几个要点:

- 1 这里的储蓄是指总储蓄,与它相对应的投资也是总投资。总储蓄由三部分组成: (1) 私人储蓄(家庭和企业的储蓄); (2) 政府储蓄,即国家预算的结余,预算赤字则为政府的负债;

(3) 外国储蓄。一国的外国储蓄,就是该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负债。应该注意到,其中任何一部分,它的储蓄和投资都不会相等,储蓄等于投资是就三者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更明确说是:总储蓄=总投资。

2 私人储蓄(S_p)。私人储蓄是其收入的一部分,收入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C)。个人可支配收入,系国民收入(即 GNP , 用 Y 表示)与税收(T)之间的差额,不过要加上为数不多的政府转移支付(F)和债券利息(N)。私人储蓄等于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

$$S_p = (Y + F + N - T) - C \quad \text{式 1}$$

3 政府储蓄(S_g)。政府储蓄为其收入和支出的差额,政府收入等于税收减去转移支付和债券利息支付;政府支出(G)则是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政府是否有储蓄,这决定于其收入和支出的对比。

$$S_g = (T - F - N) - G \quad \text{式 2}$$

若 G 小于 $(T - F - N)$, 政府预算就有结余;如果 G 大于 $(T - F - N)$, 政府预算则产生赤字。

4. 外国储蓄(S_r)。一国的外国储蓄,等于其他国家从该国得到的收入减去向该国的支出。前者表现在它的进口中,后者反映在它的出口之中。换言之,外国储蓄等于那个国家的进口减去出口。不过,由于用它的净出口来表示其他国家在该国的储蓄,所以在净出口(X)之前须加上负号,即 $-X$ 。

$$S_r = -X \quad \text{式 3}$$

5. 总储蓄为这三部分储蓄之和,而三部分储蓄之和为:

$$\begin{aligned} S_p + S_g + S_r &= (Y + F + N - T) - C \\ &\quad + (T - F - N) - G - X \\ &= Y - C - G - X \end{aligned} \quad \text{式 4}$$

在西方经济学中,储蓄和投资理论的提出,是以一条更为基本的理论,即收入恒等式为立论前提的。而按照收入恒等式, $Y - C - G - X$ 正好等于投资 I 。所以,总储蓄和总投资一定是相等的。

对于这些见解,我们不感到陌生,它们可为大家所熟悉的经济学所容纳。或者说,它丰富了我们的经济学。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例如,总储蓄在投资运行中的地位,类似 MPS 统计核算体系中的“积累基金”。积累是投资的源泉,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的认识似乎仅停留于这个地步。问题在于,任何时期投资中均包含有一部分折旧,投资对积累基金的数量依存关系,在国内经济学著作中一向缺乏科学的解释,总储蓄等于总投资的界定可弥补这个缺陷。

又比如,政府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大体相当于 MPS 中的“集体消费基金”。把集体或共同消费与个人消费区别开来,是有宏观经济意义的。但在国内一些重要经济著作中,对它与政府开支之间的关系却缺乏集体规定。而在 $NIPA$ 核算体系中,非常明确地把全部政府支出看作政府的消费。就是说,对于政府总是假定投资等于零。这是对西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写照。我国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下面即将谈到这一点。但是政府购买当作政府消费或共同消费,对于改革我国政府支出结构,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对于总储蓄等于总投资这一论断,应给予充分肯定。不过,在借鉴这一理论时,应当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私人储蓄应限定在家庭和私有企业的范围内,不可随意扩大到国有企业。这和西方

国家是应当有所区别的。因为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归国家所有,而不属任何个人。它构成本企业或政府的储蓄,而不是私人储蓄。在国有企业中,归个人所有并作为私人储蓄使用的收入,只是劳动者的收入。鉴于国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对其储蓄应作特殊规定。

第二,政府预算存有赤字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储蓄,也不等于政府不进行投资。这和西方国家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国民储蓄率低,是由于私人储蓄率不高,同时政府赤字大量增加所致。中国储蓄率高居全球之首,既是缘由国民储蓄率高,也是由于政府把自己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投资促成的。所以必须肯定,在中国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预算赤字的存在,只是表示政府进行宏大规模投资所需资金的部分短缺。

七、适度生产: 投资规模是否适量的衡量标准

以上从不同角度,并在几个相关层次上讨论了投资规模的形成。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投资规模是否适当,究竟怎样辨别并加以断定呢?

让我们从分析适度生产着手。

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考察适度消费时,须假定生产规模是既定的。无论生产增长状况如何,这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客观现实,当时的消费必须同它相适应。所以,适度消费是同现实生产相适应的消费。考察适度生产,应当换一个角度,即假定消费规模为已定,消费直接决定于收入,无论收入增长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这也都是生产面对而不可回避的现实,当时的生产亦必须同它相适应。因此,适度生产,应该是同当前消费相适应的生产。适度消费和适度生产是不可分割的。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投资不是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生产环节的基本组成因素。关于适度消费,上面谈到,无论当时生产状况如何,消费量必须适应即期生产量。所谓生产状况,既考虑了现有产业基础,又考虑到投资的作用。关于适度生产,我们解释为,无论当时收入怎样变动,生产量必须适应即期消费量。对和即期消费量相适应的生产量的估计,同样既考虑了现有产业基础,又考虑到投资的作用。所以,我们总是把投资当做生产的一个内在因素看待。基于此,要辨别投资规模是否适量,就须以适度生产为客观标准。与它相对应的范畴有二:滞后生产和超前生产。以适度生产为衡量标准,其经济意义就在于:既要防止生产滞后,更要防止生产超前。这是有利于投资运行的。

为了加深我们的认识,对于投资规模的衡量标准,还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1. 投资和生产的关系。投资对生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我们早已懂得这个道理。现在重提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实践经验表明:有时投资过度增长,造成生产超前;有时投资增长缓慢,又导致生产滞后,而且这两种情形总是反复地出现的。无论哪一种情形的出现,都意味着投资的作用未能正常发挥,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种种不良后果。所以,当今大家应形成一种共识,即谋求适度生产既是进行投资的出发点,又是实现投资的最后归宿。

2. 投资与分配和流通的关系。投资的形成和实现,在客观上依赖于分配和流通的调节。我们对这个道理也很了解,这里又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缘由,而是事出有因的。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可以看到,导致生产超前的投资过度增长,往往是由于实行“过松”的分配政策的结果;而造成生产滞后的投资持续萎缩,又主要是由于实行“紧刹车”的政府所致。反映在流通方面,前者表现为生产性需求日趋膨胀,而生产性需求膨胀又推动投入品价格节节上升;后者表现为生

(下转 38 页)

质,演变成资金拆借市场,造成令人头痛的债务链,剪不断,理还乱。如果平准基金参与国债回购交易,在其它机构或个人卖出(或买入)国债的时候,平准基金买入(或卖出)国债,在一定的期限后再按规定的价格或收益率做反方向交易。这样,就会有助于真正发挥回购交易市场的作用。一方面,它既能满足长期国债持有者临时资金需要,又能在回购期满后继续持有该国债;另一方面,它又能使短期闲置资金持有者投资于长期国债,并在短期内获得长期国债的收益,以充分利用和活化闲置资金。

四、我国建立国债平准基金的有利条件

我以为,在我国建立国债平准基金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上述的作用,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已具备推出国债平准基金的条件。

1 即将出台的《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将为我国建立国债平准基金提供法律保障。平准基金作为基金的一种,理所当然需要法规的保护,同时它也只有受到法规的约束才能正常有效地运转。

2 西方国债市场发达的国家已为我们建立平准基金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了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推动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就应该尽快建立平准基金。

3 日趋完善的国债发行机制和日趋繁荣的国债交易市场的形成为平准基金的顺利建立创造了条件。国债发行规模的逐年稳步增长,国债发行品种、期限、利率及持有者的多样化以及国债交易市场监管体系的形成,都为平准基金的设立铺平了道路。平准基金可由财政部门直接掌握,也可以由财政部门直属的以执行国家调控政策为主旨的财政证券公司来运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所在地:江苏扬州市;邮编:225001) (责任编辑:胡海刚)

(上接第9页)

产性需求日趋萎缩,而生产性需求萎缩又迫使投入品价格跌落。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都无助于投资作用的正常发挥,反而还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当今大家还应形成一种共识,这就是:要维持适度生产,关键是合理调节分配,并有节制地约束流通。

通常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这种统一不表现在别的地方,它仅仅表现在:消费对于生产是适度的,同时生产对于消费也是适度的。须知,适度消费,实际上是消费条件对包括投资在内的生产条件的适应。适度生产,实际是上生产条件对包括收入在内的消费条件的适应。因而,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实乃生产条件和消费条件的相互趋于一致。没有适度消费,也不会有适度生产;同样,没有适度生产,也就不会有适度消费。所以我们应坚定对适度生产的认识,它和谋求适度消费是出于同一目的的。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所在地:北京 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胡海刚)